

《回疆志》初纂本考*

吴 华 峰

内容摘要:《回疆志》是现存清代最早关于西域南疆的方志,它的成书经历了永贵、固世衡初纂,苏尔德增纂,达福补订三个阶段,各有抄本传世。增纂本与补订本较为常见且使用最广,初纂本则长久以来为人忽视。清人李文田曾推测《西域地理图说》即《回疆志》。通过对《西域地理图说》与增纂本《回疆志》内容比较,及其成书年代、体例安排的判断,能够确定所谓《西域地理图说》就是《回疆志》的初纂本。《西域地理图说》为《回疆志》初纂本的确定,弥补了《回疆志》成书过程的缺失环节,对考察清代西域方志草创时期的体制形态和编纂思路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西域地理图说》 《回疆志》 初纂本

引 言

《回疆志》是现存清代最早关于西域南疆的方志。“是志为新疆南部各地之通志”,“是研究清朝统治新疆初期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志书之一”^①。以最初的完成时间计,它比乾隆时期私人撰述的《西域闻见录》成书早十四年,比进呈御览的定本《西域图志》早十九年。对于人们了解乾隆时期天山南路各城政治经济、风物民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回疆志》的成书历经了永贵、固世衡初纂,苏尔德增纂,达福补订三个阶段,版本也分为与之相应的三大系统^②。常见的众多《回疆志》抄本,都属于增纂本和补订本系统。加之苏尔德的同僚福森布为增纂本作序时称:“尚书永公于宣威施惠之暇,就耳目所及、询访所得,草录此一方志略,适蒙内诏,未及成

*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项目“《回疆志》整理与研究”(146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与历史文献”(XJEDU040216A01)成果之一。

① 纪大椿、齐清顺、苗普生等:《清代现存方志概览》,《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② 吴华峰:《〈回疆志〉编纂研究》,《西域文史》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7-266页。

书。”^①致使人们多认为《回疆志》初纂本并未完成,从而忽略了它的存在。然而此书并没有因后人持续增纂补订而淹没,晚清李文田(1834-1895)批校过的《西域地理图说》一书,实际就是《回疆志》的初纂本,本文即对此加以论证。

一、《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关系蠡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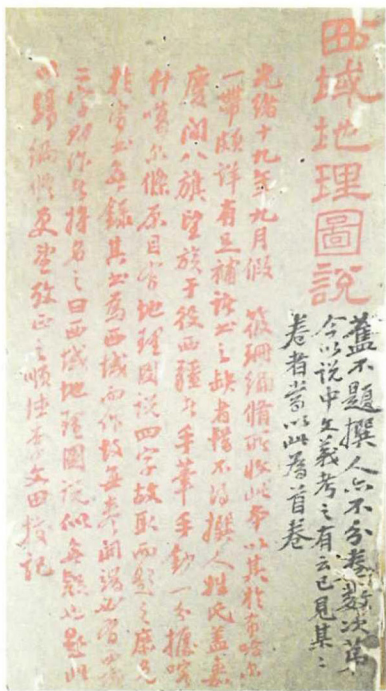


图1 《西域地理图说》卷首李文田题识

《西域地理图说》抄本藏于西华师范大学(原南充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部^②,对学界而言并不是一部罕见史料,早在1992年,阮明道先生即将之整理刊布^③。该抄本首册扉页有李文田朱、墨两种笔迹的识语(图1),交待了他从缪荃孙处借阅是书的缘起:

旧不题撰人,亦不分卷数次第。今以《说》中文义考之,有云已见某某卷者,当以此为首卷。(墨笔)

光绪十九年九月,假筱珊编修所收此本。以其于布哈尔一带颇详,有足补诸书之缺者,惜不得撰人姓氏,盖嘉庆间八旗望族于役西疆者手笔。手钞一分。据“喀什噶尔”条原目有“地理图说”四字,故取而题之,庶免于有书无录。其书为西域而作,故每卷开端必有“西域”二字,则作者将名之曰《西域地理图说》,似无疑也。题此以归编修,更望考正之。顺德李文田校记。(朱笔)

如识语所云,李文田初借是书时,无书名及著者。所谓“西域地理图说”之名,是他根据书中出现的“地理图说”、“西域”等语词推测得来,遂为后人递相

①福森布:《回疆志序》,丁氏“八千卷楼”抄本,南京图书馆藏(馆藏编号:GJ/132524)。按,就笔者所见各种苏尔德增纂本《回疆志》抄本,以此本笔误最少。后文所引《回疆志》内容,均出自此本。

②《西域地理图说》,清抄本,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登记号:103014-21)。后文所引《西域地理图说》内容,均出自此本。

③阮明道主编:《西域地理图说注》,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另傅平襄、李凤仪《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第1-13页)、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23-28页)都对此抄本进行了研究。马大正《读〈西域地理图说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5期,第30-32页)、日本明代史研究会编《明代史研究》第21号(汲古书院,1993年,第65-66页),对整理本均有介绍。但是诸家都未意识到《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的渊源。

沿用。实则“西域地理图说”与该著只述“回疆”概况的内容颇有名不副实之嫌。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姑且使用这个约定俗成的旧名。

李文田还曾据此缪荃孙藏本另外抄录《西域地理图说》一份。李抄本《西域地理图说》初以《回疆志》之名收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该书胶卷,馆藏著录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善本,八卷,永贵撰。清顺德李氏钞本,清李文田手批并题记”^①。抄本首页天头李文田眉批云:“光绪十九年从缪小山编修借钞此本。无书名撰人。寻‘喀什噶尔’条原目自称曰‘地理图说’,故题曰《西域地理图说》耳。”(图2)正可与上引原抄本识语相印证。李文田抄本调整了底本“行文从左到右直行式”的格式,也不存在底本“文句错漏之处较多,可能是依据作者底稿誊抄的写本,誊抄后对错抄漏抄文字仅作了个别更正,从笔迹看,誊抄者非一人”而造成的讹误^②。

最重要的是,抄本卷首还保留了李文田光绪二十年所作题识一纸,明确指出《西域地理图说》即《回疆志》之蓝本:

光绪癸巳年,假钞此册于缪小山编修。及秋冬间按试定州讫,观定州王氏藏书,借得《回疆志》四卷钞之,方知此书乃苏尔德《回疆志》之蓝本。本亦名《回疆志》,乃礼部尚书永贵参赞彼土时所撰也。书作于乾隆己卯,草创未成。及苏尔德同副都统福森布驻护喀什噶尔,乃据此本重改定之,仍名《回疆志》四卷云。

光绪十九年李文田抄阅此书时,并未将《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联系起来。时隔一年,当他在河北定州王氏“括斋”见到苏尔德增纂的四卷本《回疆志》时,立刻凭借其深厚的史地学素养,辨认出二者实为一书。

瞿冕良《中国版刻辞典》“读五千卷书室”条也记载过这一李文田手抄“永贵《回疆志》8卷”^③。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羽田纪念馆中亚研究会收藏的一部写本《回疆志》,封面亦题“据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清顺德李氏钞本”,此写本只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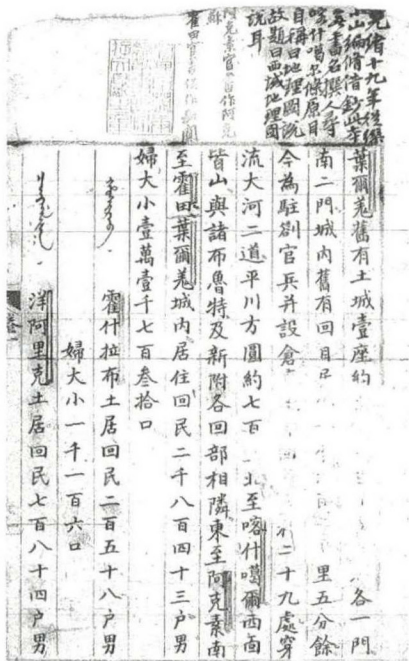


图2 李文田抄本《回疆志》

①馆藏胶片编号:Harvard-Yenching Microfilm FC5404。

②阮明道:《〈西域地理图说〉序》,《西域地理图说注》,第2页。

③瞿冕良:《中国版刻辞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1页。

录了正文内容,将李文田的题识和零星批语全部刊落。但是由于李文田当时的发现已经来不及标记在缪荃孙的藏本上,以致后来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仍旧延用李文田第一次题记的观点,将它作为独立的《西域地理图说》来定论。

二、《回疆志》对《西域地理图说》内容的承继

李文田百馀年前关于《西域地理图说》即《回疆志》的判断独具慧眼,他并未详述论断过程,但抄录两著时对内容的比较应当是他立论的重要依据。从史料运用的一致性考察,二者的确具有明显的承递关系,足以证明李文田观点的准确性。

《西域地理图说》抄本原不分卷,八个专题依次厘为八册,故李文田及今注本均将其视为八卷。“城村户口”记南疆八城的建置人口。“官职制度”载各城伯克数目与职能,旁及官员图记、器械军装。“征榷税赋”总述平定回疆前后的税赋变化,分述各城赋税项目。“市余钱币”载市场交易、货币种类及铸币制度。“土产时贡”记每岁入贡物品与回疆特产。“外夷情形”详述毗邻诸国地理交通,及南疆各地卡伦设置。“衣冠服饰”介绍南疆各城和邻国人物服饰。最后的“垂古胜迹”部分,收录乾隆御制《双义诗》、《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之碑》、《御制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并附录各城杂记。

苏尔德增纂《回疆志》将全书体例统一为四卷。卷首系两通碑铭,回疆地理图说、新疆全舆图、回人相貌图。卷一载天时、地理、山河、城池。卷二记回教、面貌、性情、房室、衣冠、饮食、婚姻、丧葬、耕种、织纴、交易、畋渔、五谷、瓜果、菜蔬、草木、花卉、物产、杂记。卷三分述官制、各城户口。卷四叙赋役、钱法、刑法、隘卡、邮驿、外夷。

从目录看,两书体例差别较大,实际内容却多有重合。约占《西域地理图说》二分之一篇幅的“城村户口”、“官职制度”、“征榷税赋”卷全部为苏尔德所沿用,“市余钱币”、“衣冠服饰”、“垂胜古迹”三卷内容也绝大部分与增纂本相同。苏尔德采取了以类相从的编纂原则,将《西域地理图说》中的相关内容重新整合归类加以吸收。如《图说》卷一对“霍田”地区城村人口的记载,增纂时被分别置入卷一和卷三中(详见表1)。

表1

《西域地理图说》	“八千卷楼”抄本《回疆志》
霍田有六城,内无名霍田者。霍田乃该部总名,原指其东南、西南两山,雪水于其左右流至雅布喀阿满地方,会归一河,其地适在两水夹流之中,故名曰霍田。平川约五百里,所有六大城内,一名伊犁启,约三里七分馀,东、西、南、北四门;一名哈拉喀什,约二里九分馀,东、西、北三门;一名玉龙喀什,约二里五分馀,东、	和闐六城村内无名和闐者,和闐之谓乃该部落总名。由南山流出雪水,左为合泰,在玉陇喀什;右为克里雅克素,在哈拉喀什……和闐平衍处约有五百馀里。一名依里齐,约三里七分馀,东、西、南、北四门。一名哈拉喀什,约二里九分馀,东、南、北三门。一名克里雅,约二里九分馀,

西两门；一名克里雅，约二里九分馀，东、西、南、北四门；一名车勒，约二里馀，南、北二门；一名塔克，约一里馀，西北一门，西南一门。六城远近不一，庄村接连不断。西北至叶尔羌属桑竺地方，东北至阿克苏，西南与后藏连，正南皆山，东及正北悉系戈壁，无路可通。戈壁者，犹言沙磧、瀚海也。 伊里起城内及各属庄村，居住回民共计四千三百八户，男妇大小一万四千六百六十一口。 哈拉哈什城内及各属庄村，居住回民共计四千二百七十二户，男妇大小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七口。 克里雅城内及各属庄村，居住回民共计二千二百二十九户，男妇大小六千二百二十四口。 玉龙哈什城内及各属庄村，居住回民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二户，男妇大小六千三百一十八口。 缀勒城内及各属庄村，居住回民共计九百三十八户，男妇大小二千六百一十六口。 塔克城内及各属庄村，居住回民共计二百三十九户，男妇大小七百一十六口。 以上霍田六城各属大小庄村，居住回民共计一万三千八百馀户，男妇大小约略四万三千五百馀口。(卷一：城村户口)	东、南、西、北四门。一名塔克，约一里馀，南、北二门。一名玉陇哈什，无城。一名车勒，无城。以上六城村远近不一，西北与叶尔羌相通，西南与后藏相通，东面与沙州相近，一带戈壁无路可通。正南皆山，正北大沙戈壁，东北与阿克苏相通。(卷一：城池) 和阗伊里齐城内以及各村庄，居住回民共计四千三百八户，男妇大小一万四千六百六十一口。所属城村五处内： 哈拉哈什城内以及各村庄，居住回民共计四千二百七十二户，男妇大小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七口。 克里雅城内以及各村庄，居住回民共计二千一百二十九户，男妇大小六千二百二十四口。 玉陇哈什地方以及各村庄，居住回民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二户，男妇大小六千三百一十八口。 车勒地方以及各村庄，居住回民共计九百三十八户，男妇大小二千六百二十六口。 塔克城内以及各村庄，居住回民共计二百三十九户，男妇大小七百一十六口。 以上和阗伊里齐并所属各城村，回民共计一万三千八百馀户，男妇大小约计四万三千五百馀口。(卷三：各城户口)
--	--

如上表所示，两著使用的材料乃至表述方式基本没有差别，尤其是对和田城村人口的记录完全一致。二者唯一的不同在于，《图说》地名写法全部采用旧制，如“霍田”、“阿克苏”、“伊里起”、“缀勒”诸地，《回疆志》分别作“和阗”、“阿克苏”、“伊里齐”、“车勒”。西域地名多系音译，汉文转译写法不一。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之际，军机处即曾会同会典馆并繙书房，议将“至伊犁各处地名内，吐尔番应改称吐鲁番，鲁古沁应改称鲁克沁，波罗他拉应改称博罗塔拉”^①。乾隆二十八年《钦定西域同文志》付梓，天山南北路地名译写才由官方正式统一。苏尔德《回疆志》增纂于乾隆三十七年，自然要使用规范后的地名。

从两著对罗布淖尔人和木素尔冰岭的描写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继承关系(详见表二)：

①《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五，《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48-749页。

表2

《西域地理图说》	“八千卷楼”抄本《回疆志》
一,罗布渥尔部落回人一枝,每年应(交纳)海龙皮玖张。 一,罗布渥尔回人,每年交纳哈什鸟翎壹百枝……因该处并不耕田牧畜,唯籍海内所得之鱼而为食。所得之水獭、海龙等皮张,货换其布而为之衣,附海陆地,自生野麻,采而为之毡帐。此外盖无别项出产。(卷三:征榷税赋) 故参赞尚书舒(赫德)等差员备礼,往而祭拜,风雪暂止,即使人开冰凿坝,以为可行梯登,台道始通,因而具奏,奉旨按年差员往祭,至今每年肆季捧旨备礼往祭。仍设回民一百二十拾户,豁免其科赋,令其无时修理冰阶梯登,其势虽仍自变换无息,却有可走道路。(卷八:垂古胜迹)	参赞尚书舒公具奏,每年致祭,列入祀典,安设回民一百二十户,专事修凿,今已为驿路衡途,商旅通行矣…… (洛卜渥尔)各湖池之北,大湖之南,有一种回人,不种五谷,不牧牲畜,惟划小舟捕鱼为食,或采野麻,或捕哈什鸟,剥皮为衣,或以水獭等皮,并哈什鸟之翎,持往各城贸易,易布以为衣带,此种回人,世居海边,不惟不通中华,亦不与各部落相通。(卷一:山河)

《回疆志》将《西域地理图说》中分属于两卷的文字,合并入卷一“山河”条中,虽然内容有所精简,但史料运用显然是一致的。这也是现存文献当中对罗布泊人和冰岭最早的记载。在大多数情况下,苏尔德都是通过调整内容和凝练文字对初纂本内容加以修改继承,类似的例证在两书中不胜枚举。比如《西域地理图说》“垂古胜迹”中的两通碑铭,被《回疆志》移置卷首,以突显表彰其独特意义。再如《回疆志》卷二“交易”条继承了《西域地理图说》关于南疆巴杂尔情形、度量单位特点的记载,删去诸如“手工艺工之贪饕克扣,却与内地之行计异甚”等与主旨无关之语,从而使《回疆志》的结构与语言更加凝练,逻辑层次更加明晰。

阮明道先生在《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一文中,也对两书部分内容进行过比较。如其指出《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所载南疆卡伦数目不同:“卡伦部分,哈尔沙尔、库车各属卡伦数,两书记载均同;乌什属卡伦,《西域地理图说》五处,《新疆回部志》四处;喀什噶尔属卡伦,《西域地理图说》九处,《新疆回部志》十处;叶尔羌属卡伦,《西域地理图说》五处,《新疆回部志》三处。由于撰写著作时间有先有后,各记设置卡伦数目不同,这是合符情理的。如乾隆二十六年二月,舒赫德奏新疆台站官兵更换事,奏入,军机处议准:‘军营所设台站,酌量繁简,随时增减移撤。’”^①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两书因成书时间差异而导致内容的动态变化,故所举例证并无意义。

阮文还将《西域地理图说》与吴丰培油印本《新疆回部志》、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本《回疆志》中的“火滩”条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三书所记大致相同:“行文顺序一致,所采资料应为同一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回部志》此段文字

①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第25页。

中,偶然留下‘阿克素’之称,与《西域地理图说》通译‘阿克素’相同。阿克素与阿克苏,是同名异译,除《西域地理图说》外,其他文献很难找到通译‘阿克素’的。”^①他还推测“《新疆回部志》所采上述资料来源,可能与《西域地理图说》相同……据此分析,这段资料,《回疆志》(包括《新疆回部志》)有可能采自《西域地理图说》抄本。如此点可成立,则永贵等编撰《回疆志》时,在南疆尚可见其抄本”^②。这段论证,事实上等于承认了《回疆志》系承继《西域地理图说》而来。

阮明道先生没有意识到《西域地理图说》即《回疆志》的初纂本,认为“就两书内容看,详略各异,有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同,而大部分内容则多不相同”^③,通过对两书内容的再审视,这一结论并不符合实际。阮文中所举之例,大多数反而为确定《西域地理图说》即《回疆志》初纂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证据。

三、《西域地理图说》为《回疆志》初纂本的旁证

对编纂者行实、成书时间以及内容完整度进行考察,也能够为《西域地理图说》系《回疆志》初纂本增加旁证。

首先,《西域地理图说》正文中叙及的时间节点下限,截止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试举两例:卷二“官职制度”有“沙尔胡尔、克尔品等处五员阿奇木伯克缺出,仍以本处应升人员拣选排列,奏请钦点。六、七品者缺出,均以本地人员内拔补,年底汇题等。因于二十八年四月具奏,奉旨着军机处大臣议奏”。卷三“征榷税赋”有“故又具奏,将(阿克素)贰十柒年应给散库之贰拾陆年铸得之钱,权照原议,均匀散给,其贰拾捌年春季应抽之贰成钱文,做为春秋两季收纳。自贰拾捌年起,将各城应纳铜之斤数,另为均匀拟酌摊算,较之该城回民户数,定以该城应纳铜斤,铸得新钱,即照贰拾柒年之例散给”。阮明道据此认为其成书“可能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④。傅平骧、李凤仪亦谓“《图说》内容反映乾隆二十七、八年间的史实颇多”,且“由于书中所记回城多用旧名,说明《图说》成书的时间早,作者还不知道后来改定的名字”^⑤。

《回疆志》初纂者永贵(?-1783),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以左都御史代舒赫德为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同年三月抵任:“海明不称喀什噶尔办事之任。现命永贵前往,更代舒赫德。但抵任仍需数月”,“命舒赫德暂往喀什噶尔

①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第27页。

②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第27页。

③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第24页。按,阮明道先生所使用的《新疆回部志》,为《边疆丛书续编》中所收吴丰培先生校订本。他同时参考了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本《回疆志》。这两部著作均属于苏尔德增纂本《回疆志》系统,阮文并未辨别两者之间的关系。

④阮明道:《〈西域地理图说注〉序》,《西域地理图说注》,第2页。

⑤傅平骧、李凤仪:《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第3页。

办事,候永贵交代”^①。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永贵在回疆办事得力,“上嘉其办理妥协,下部议叙加一级,八月还京”^②。《西域地理图说》中记载了不少永贵在办事大臣任内的政绩,如卷三“征榷税赋”有“贰拾捌年径(经)议政尚书永(贵)等审视,得各外部落贸易回人,俱知其乌什素无税科,故多不走喀什噶尔,皆由山后偷往乌什等处贸易……故忒(特)具奏,酌与外部落搭界之乌什,照依喀什噶尔一律抽收回人贸易税赋”。卷五“土产时贡”曰:“近因总理各城事物议政尚书永(贵)等议酌奏定,每年将葡萄贰千觔内,上好者拣贰、叁百觔解送内廷。”

另一位编纂者固世衡(?-1771)原系归绥道员,乾隆二十四年受山西将军保德、同知呼世图挪用公款案牵连,发配“叶尔羌效力赎罪”^③,二十九年遣戍期满。《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八年八月条载:“据永贵等奏称:喀什噶尔办事主事伊灵阿、道员固世衡,至明年三年期满,其员缺无庸于内地派人更换……固世衡、挖穆齐图、八十尔俱系有罪发往之人。俟将伊等获罪缘由查明具奏时,另降谕旨。”^④十二月条又载:“道员固世衡在喀什噶尔办事奋勉,实属称职,应请旨交部议叙等语。固世衡实心办事,殊为可嘉,著加恩交部议叙。”^⑤固世衡必然是由于遣戍期间办事奋勉得到永贵赏识,得以与之共同修纂《回疆志》,故乾隆二十八年永贵刚回到京城,就在乾隆帝面前为固世衡进言开脱。

永贵、固世衡留驻喀什噶尔的时间确与《西域地理图说》成书年代相符,由他们的行实,还可进一步明确《回疆志》初纂本应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至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之间。

其次,宏观来看《西域地理图说》内容基本完整,但个别细节的阙载,仍然昭示出它是一部“未及成书”的初纂本。傅平襄、李凤仪曾举出全书四处尚未完稿之处:“这八册似非全帙,比如《外夷情形·交通》册篇末记辟展卡伦,只有一个标目并无下文。《土产时贡》册篇末记‘今特撰若干则,附列于山川图右’。但所谓‘山川图’不但不见于本册,也不见于他册。《衣冠服饰》册篇首说:‘至于各部男女身势已见风俗教化部门。’按《图说》八册中未见有‘风俗教化’门。《垂古胜迹》册篇末记英阿杂尔城东北,牌素巴特属凉噶尔地方的地洞,但叙述至‘今经二百余年并……’处便戛然中止。以上均说明这部《图说》并非完帙。原因可能是作者尚未写完,便因故中止;也可能是作者请人清稿,校改乃作者复

①《清高宗实录》卷六二八、卷六二九,《清实录》第17册,第9、19页。

②铁保:《钦定八旗通志》卷一六二,《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10780-10781页。

③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八,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363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三,《清实录》第17册,第769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七〇一,《清实录》第17册,第839页。

阅时所为,但复阅并未完毕。”^①阮明道也指出《图说》“写本篇幅不大,叙事简略,有的阙载……写本所记,也有传闻失实处。如云布哈尔都城‘周围三百餘门,一门至一门五日路’……由上可见,此写本非定本,而是一部尚待整理完善的初稿本”^②。

除上述两文所举,《西域地理图说》卷六“外夷情形”云:“其地與山河,并其途路情形,暨我部相达之隘口道路,不可不记录,以备之考阅焉。是将图说妥具于章右。”但在后文中,并未见“图说”。由此可知,甚至李文田初见此书并据以为之命名的“地理图说”四字,可能也是永贵等人预先设计而未及完成的部分。待到苏尔德补纂《回疆志》,才在卷一中补充了“西域地理图说”一节,并绘制全舆图一幅。而“山川”、“风俗教化”及“杂记·地洞”诸缺失内容,也在增纂时得以补足。福森布《回疆志序》称苏尔德为完成《回疆志》“复详加考核,广为搜访,删其冗复,增其简略。并绘图于前,披阅瞭如指掌。录杂记于末,巨细无不兼该”,正是对此过程的实录。

《西域地理图说》原抄本中笔误较多,李文田最初认为此书“盖嘉庆间八旗望族于役西疆者手笔”,随即又认定其“乃乾隆初定新疆之时旗人手笔”^③。阮明道猜测“作者应是通晓满文初习汉文的满洲旗人”^④。清廷在南疆地区因地制宜保留原有伯克制度,留驻官员相对较少。在回疆初定之际,人才匮乏给修志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很可能在《回疆志》修纂过程中,永贵只充当宏观策划,乃请固世衡具体撰写,又经他人誊抄,故有不少失误。尽管固世衡“交部议叙”提拔已经是永贵回京以后之事,但随着主持者的暂时离任,编纂也暂告停歇,并留下诸多缺憾,直到苏尔德赴任,才再续前缘,卒成此志。

四、馀论

除了因纂修时间先后不同导致两书中某些数据与条例的变动外,《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也有完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数端。

第一,《西域地理图说》“城村户口”卷每处汉语地名前,都另外标注着该地满语译名。“土产时贡”卷介绍“饕”、“茶”、“糖”等十餘种物品,也附有其满语称谓。“外夷情形”卷,作者谓诸藩属邻国“地名人名、道路山河、游牧之名,俱以汉字译记,恐其音韵稍有未给(恰)之处,经久音流,则是半边情事,往涂迷其真迹。今将何部落、某头目、游牧于何等地方,忒(特)具清字,记于篇末”。增纂本则未采用满文。实则从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到私人撰述《西域闻见录》,

①傅平襄、李凤仪:《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第12-13页。李文田抄本“垂古胜迹”卷末“地洞”条后亦批“无可访补”四字。

②阮明道:《〈西域地理图说〉注》序,第5-6页。

③《西域地理图说》第八册卷首李文田墨批。

④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第24页。

再到后世众多西域方志,均保持由汉语撰述的统一规范,《西域地理图说》中的满文书写则是一个特例。

第二,增纂本《回疆志》删除了《西域地理图说》“市杂钱币”和“衣冠服饰”卷中所配的回疆钱币、回人衣帽图,于卷首重新绘制了“新疆全舆图”及九幅“回人外貌图”^①。

第三,《西域地理图说》“官职制度”卷比《回疆志》多出“器械军装”一段。“土产时贡”卷事无巨细地记述各地物产,器物如布匹、小刀,植物如雪莲、银杏、木耳,动物如野鸭、猫鼠等。《回疆志》对此卷只字未用,而代之以胡桐木、琐琐柴、芨芨草、大头羊等典型西域风物。同时增加了回教、婚姻、丧葬、邮驿等新内容。

第四,《西域地理图说》“外夷情形”卷谓:“况迹今我部回城均照依内地修持,其地理大概,已与他部各异,则境外诸部,自固是为外夷,但其地脉皆与我部连毗,故其情形是不可以不深悉者。”对与南疆接壤各国之历史概况、地理远近详加考录,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增纂本则未将邻国作为重点,只简述了哈萨克、布鲁特、色呼库勒、蒿汉、拔达克山、爱乌汉、博罗尔七地的风土人情。其目的不在防范边患于未然,而在于鼓吹“庶览者咸知我圣朝幅员之广,人物之异,品类之庶”^②。

苏尔德在《回疆志自序》中已经明言增纂此书时并未步趋原稿:“前驻镇尚书都统、今大宗伯永公贵,与观察使固君世衡编有《回疆志》一书,但所载较之于今,考其时事不无参差,爰就其原本一一核实,于其繁者删之,略者增之,分门别类,以成西域回疆之志。”而是在其基础上根据时事变化,加以增删补订、分门别类而成书。所以这些差异并不能动摇《西域地理图说》为《回疆志》初纂本的结论。而明确《西域地理图说》即《回疆志》初纂本,既弥补了《回疆志》成书过程中缺失的一环,使得乾隆年间回疆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情形,在该书历经三代修纂的接力过程中得到动态揭示;也为今人考察清代西域方志草创时期的体制形态和编纂思路提供了绝佳的视角。从中亦折射出清朝西域经营初期南疆各级边吏的文化心理,以及他们为边庭地区长治久安所寻求文化建构的努力。

【作者简介】吴华峰,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西域文献。

①“八千卷楼”本《回疆志》中只有“新疆全舆图”目录而插图不存。在另一种“南屏理”抄本《新疆回部志》中则保留了这几幅插图。可见苏尔德确实曾为《回疆志》补绘过插图,只是由于传抄者的原因,在有的版本中将插图省去了。

②苏尔德:《回疆志自序》,“八千卷楼”抄本。